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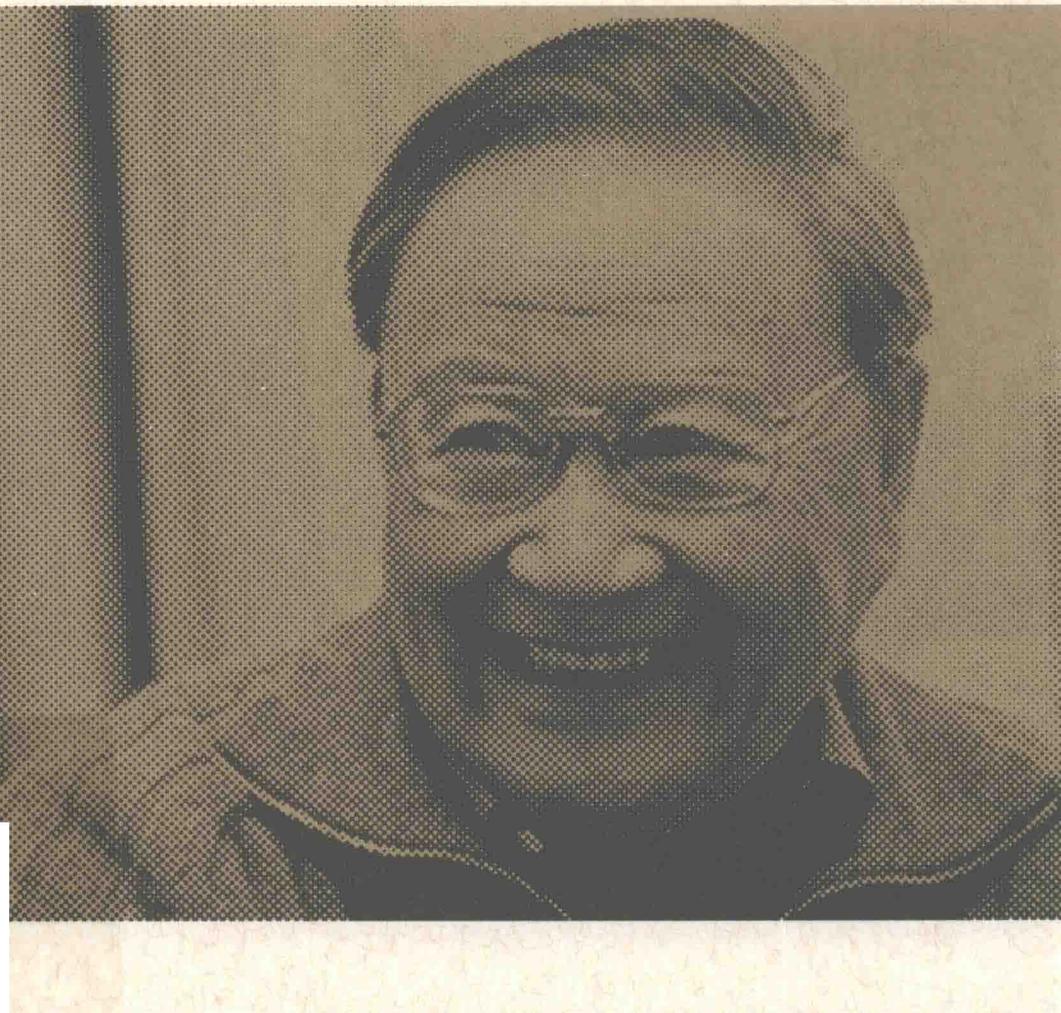
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

王岳川 主编

王元化评传

王丽丽 著

黄山书社



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

王岳川 主编

王元化 评传

王丽丽◎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元化评传/王丽丽著.—合肥:黄山书社,2016.8

(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

ISBN 978-7-5461-5538-8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元化(1920—2008)—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9781 号

王 元 化 评 传

WANGYUANHUA PINGZHUAN

王丽丽 著

策 划 汤吟菲 朱莉莉

责任编辑 张向奎 代立媛

装帧设计 未 淇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 刷 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186 千

印 张 14.25

书 号 ISBN 978-7-5461-5538-8

定 价 46.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总 序

近百年来，中国美学文论学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断扩张中，艰难地生产着自己的文化和美学新思维，在欧风美雨中不断吐纳吸收的同时变更着自己的美学文艺学立场。然而，当美学和文论边界不断扩大化的时候，中国美学文论身份却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在长达一个世纪之内，学者们在一个一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美学家文论家，却没有看到中国美学文论界整体性地对中国百年来的美学家文论家加以整体研究的著作。

尤为严重的是，中国美学界文论界在对整个西方美学界文论界加以研究的时候，已经从宏观研究进入到微观研究层面，对西方古典美学家文论家、西方近现代美学家文论家、西方后现代美学家文论家的研究著作已多不胜数，而整个西方对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了解和研究却几乎是空白。这种文化美学上的不对等性，导致中西美学界文论界产生

了巨额的“文化赤字”。这种“文化赤字”可能引发的“文化战争”危险,迄今仍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一、中国美学家文论家需在国际话语中重建身份

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其当代美学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中国面对世界,世界不可能背对中国。东方大国的美学文艺学在失去自我身份后亟需重新反省并获得自我身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重新检讨中国美学的精神价值取向,从全盘西化的美学文论研究的盲视中走出来,重新以“走近经典”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审视中西文化深层对话时代中的中国美学文论身份;从西方美学文论的中国化到中国美学文论经验的世界化的转型中,关注文化创新与文学理论创新的同步性,进而守正创新——“走近经典”并“创新经典”。

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

文化传统、希伯来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元化、多样化。

当代西方文论的全球扩张,深层原因是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全球播撒。现代性使当代西方艺术具有了文化霸权的话语平台。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殖民主义相关,短短 200 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但反过来,现代性也让西方和世界深受其害。因为在现代性发展和大国崛起的几百年历史中,世界告别了“王道”而成就了“霸道”,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并走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于是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性开始放弃价值升华的追求,现代艺术家开始感受世界堕落般的“恶心”。艺术家堕入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的泥潭,对人类后殖民未来充满了悲观意绪。

西方乘着全球化的翅膀开始了文化霸权的飞翔。霸权是一种在文化领域中争夺“领导权”或“控制权”的话语,将历史上属于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扩张化,使之成为人类对西方话语权力的普遍认同。于是,话语权力不是作为强权而是作为权威而得到行施,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被政治化。人类在价值崩溃中彻底地世俗化,人类精神生态失衡已经习焉不察地成为意识形态符码。

当然,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从而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使中国文论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

二、从西方文论中国化到中国文论经验的世界化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以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汉语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性诗学特征,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事实上,在文化美学领域中国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世界共同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美学文论应该参与到建立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只有这样,当代理论家才能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犹豫,才能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态中寻找中国式的文论光辉和美学神采。

当代中国美学文论流派原创、范畴创新、体系“守正创新”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充分关注的时候,中国文论“守正创新”势在必行。

三、在“守正创新”中整体展示中国美学文论大家

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新世纪中国文论应在当代文论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

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中国美学播撒和新理论输出,形成中西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在美学文论创作方式、本体结构、接受方式、传播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美学文论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21世纪中国美学文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走近经典为了继承,创意经典为了图新,美学图新为了精神原创,这表达了我对中国美学文论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美学观念、美学形态、文论方法、文论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守正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软实力,可以表征美学文论新的大国形象。

当代美学家文论家努力的方向是文论原创性,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美学家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文论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美学家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文论大家。可以说,在当代西方美学文论研究了30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不断创新的中国美学文论精英。只有中国美学文论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论的文化输出!美学文论国际互动是新世纪中国文论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美学文论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美学文论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高水平开创性学术丛书出版困难的时期,黄山书社决定推出这套《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令人感佩。首批推出朱光潜、宗白华、杨晦、季羡林、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钱中文、胡经之、童庆炳

等十位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的评传。评传在“评”的方面突出对所评专家学术成果的评介，在“传”的方面则尽可能地钩沉出所评专家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趣事，使其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通过丛书的出版，力求打破多年来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对国外思想家了解较多，而国外对中国当代思想家却知之甚少的局面，为中国当代“文化输出”做一些推动性工作。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能对这些经历了 20 世纪欧风美雨的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精神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能让更多的读者领略和认识这些跨世纪美学大家的审美风采，从而推动新世纪中国当代美学文艺学研究的国际化。

是为序。

王岳川

2015 年 1 月 8 日于北京大学

自序

本书对王元化学术和思想的评述，暂止于传主《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的出版。对于王元化而言，1979年年底决不仅仅标志着一个自然年代的即将终结。自从在1955年被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王元化不得不进入漫长的阅读、思考和学术潜修的阶段。伴随着《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一王元化前半生的集成性和标志性成果的最终问世，王元化背负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污名，也于当年不久后被彻底洗雪。换言之，1979年这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界分之年，同时也成了王元化一生二世的分水岭或界碑。如果可以将王元化学术思想的成长比作一棵大树的话，那么，80年代可以称作王元化学术生命的发荣开花期，90年代以后是硕果累累的成熟收获期，而1979年之前，则是根系形成深固和主干茁壮成长的积累孕育期。

之所以主要聚焦王元化学术思想的奠基阶段，除了这一时期对研究者而言具有较为合适的历史距离之外，还因为笔者拥有一定的自信：顺着胡风及其同仁这一座

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不可绕过的高峰所延伸铺展开来的脉络，探究并触及王元化在八九十年代新创和抵达的另一座思想史的高峰，其取径和研究的视角不会轻易地遭人取代。相反，借助于这种相对特殊的角度，我们还有可能在原本看似独立耸峙的两座山峰之间，揭示和呈现出前此被遮蔽或忽视的实质关联，从而进一步促使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史的图景显得更加丰满和真切。

这就很自然地涉及一个很多人都深表关切的问题：王元化到底是不是“胡风集团分子”？包括王元化在内的所有当年涉案人员陆续获得平反，就已经从事实上反证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罪名实系捕风捉影。如果说的“集团”都是“捆绑”而成的，那么自然也就根本不存在过什么“分子”。或许，更加学术和有效的提问方式应该是：胡风事件对王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王元化的一生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胡风事件”对王元化生命和思想历程的影响既深且巨。尽管晚年的王元化十分注意与“宗派”意义上的“胡风分子”之名保持显著的距离，但也没有在思想方面彻底否认自己与胡风等人曾经存在的一致性。也许恰恰是因为从一开始，王元化就不是出于所谓“宗派”的理由而与胡风等人交往，所以他们的接近反而更加纯粹地体现在思想方面。

实际上,这也是本书各章将要逐渐呈现的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到 80 年代中期以前,王元化绝大部分的思想劳作成果,都是他与自己 50 年代的精神危机和从危机中产生的疑问不断对话的产物。因此,尽管王元化早在 1938 年就开始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和工作,但他最后之所以能够在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留下可圈可点的独特印迹,以至于成为本书评传的对象,其思想的真正起点,只能从发生于 1955 年的“胡风事件”中去寻找。

也正因为如此,本书还想表达的一个想法是:虽然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王元化逐渐从胡风及其同仁这座思想史高峰的影响阴影中走出,在文化和思想史研究领域开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并在 90 年代以后较长时期占据学术文化界的引领地位,但这一客观情势的造成,并不是由于王元化事先期待并预见到自己将要被思想史选中,所以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般地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他并不情愿的境遇中,在历史非常吝啬和苛酷地赋予他个体的极为有限的可能空间里,小心翼翼地摸索和尽己所能地艰难挣扎所开掘而成的。尽管事后证明,他所开掘的所在正好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穴位,但这一意料之外的“幸运”的获得,正如晚年的王元化自我总结的那样:“不是我选择了这条道路,而是道路选择了我,时代选择了我。”^①

此外,王元化或许也是在新时期之后,最早提倡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中重视传记理论研究和传记写作的人。1981 年,在一篇为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作的文章中,王元化呼吁文艺理论界和鲁迅研究专家分头并进,在对国外“各种传记的写法”与“我国史书中的传记文学”“加以总结”和“比较研

^① 吴琦幸:《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4 页。

究”的同时，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开风气精神”，“写出几本具有不同风格、体例互异的鲁迅传”来。

王元化向当时可能的《鲁迅传》的作者们提供的可以借鉴和取法的传记作品的范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盖朗琪罗传》那种格局的”“引人入胜的著作”：

不堆砌资料，不炫耀广博的征引，不在无关宏旨的细节上作繁琐的考证，而是深入到鲁迅的内心生活中去，探索他的精神世界及其复杂的历程……^①

另一种则是：

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以别林斯基文学活动为中心的《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那样，从我们现代文学史的波澜起伏的背景上，理出鲁迅的思想脉络和他在每一历史阶段留下的战绩……^②

当然，第二种写法“需要对鲁迅的对手”以及属于“同一革命营垒的”社团和个人的所有活动，“都进行系统的探讨，占有充分材料”，才能作出比较公正的历史评述。

王元化对传记作品的重视和喜爱，也使他在晚年明显表现出了撰写自

^①王元化：《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见王元化：《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②王元化：《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见王元化：《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3—54页。

传的强烈愿望，并部分地付诸行动，但终因不可抗的因素，没能圆满完成。

如果对照王元化所心仪的两种传记的范式，应该说，本书的写法更接近于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主要通过对王元化本人著作的细致解读和深入阐释，来构建和串联王元化的思想传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附带折射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些重要方面。毕竟，作品，仍然是追溯和再现一个人思想历程所可依凭的最清晰和最可靠的踪迹。

2015年12月

目 录

自 序	001
第一章 党内少有的文艺理论家	001
一、父亲的教育学	001
二、抗战文艺的新启蒙	005
三、孤岛反思	010
四、王元化与胡风	023
第二章 王元化读《小逻辑》	038
一、值得深究的问题	038
二、由痛楚转化而来的洞察力	044
三、思辨的力量和秘密	058
第三章 王元化读莎士比亚	075
一、读莎历程与研究进路	075
二、以戏剧人物论为中心	081
三、比较的方法和视野	088
第四章 《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诞生	098
一、王元化解析《文心雕龙》	098
二、《黑格尔论美的法则》	114

王元化评传

三、《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三重结构	132
四、学术沉积的其他地层	174
王元化先生学术年谱简编	197
参考文献	206
致谢(代后记)	211

第一章 党内少有的文艺理论家

一、父亲的教育学



>> 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



>> 王元化的母亲桂月华

每当追溯王元化(1920—2008)

家学渊源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多半是他母亲一系的显赫背景。身为湖北沙市基督教圣公会第一任中国会长，并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就创建了沙市第一所新式学堂的传教士——王元化的外祖父桂美鹏，在自己的家中也培养出了一门新式知识分子。长女桂月华(1887—1986)尽管19岁就嫁给了王元化的父亲，但曾在上海圣玛丽女校就读，工诗词，通英语，且曾从一位芬兰女医士学过医；从王元化的母亲往下，依次是王元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舅舅桂质庭，曾赴英国和欧洲其他